

## 伦理学容量与农业文明发展的史学启示

任继周<sup>1</sup> 方锡良<sup>2</sup> 林慧龙<sup>1</sup>

(1.中国草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农业部草牧业创新重点实验室,  
甘肃 兰州 730020;2.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伦理学容量意指社会伦理观对各类社会组分的系统性包容,藉以保持社会稳定。社会在系统耦合中发生系统进化,释放生产潜力,推动社会进步。系统耦合与系统相悖并发。前者释放生产潜力,为社会进步的正值,后者反之,为系统进步的负值。中国农业社会为城乡二元结构,其系统耦合所生产正值,即社会效益,绝大部分为社会强势的城市占有,是为社会发展的受益方;而系统相悖发生的负值,则由社会弱势方农村全部承担,所获社会发展效益甚少,或根本不得效益,是为社会发展的少受益方,或受害方。因而城市与乡村形成利益对立的双方。以往对社会进化弱势群体关注不足,或阻碍社会发展,或发展为社会乱源。在皇权社会的农耕文明,勉强保持了伦理学容量的脆弱稳定。但在后工业化的今天,社会系统多元化迅速发展,多重系统耦合与系统相悖并存,其社会矛盾远非原来的农耕文明伦理容量所能包容。中国农民从西周以来所背负的不公正待遇,引发系列社会问题,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当前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下,社会发展势不可挡,实现农业现代化势所必然,与之相适应的伦理学容量势必巨大扩容,新的农业伦理学已经曙光初现。

**【关键词】**伦理学容量;系统耦合;系统相悖;农耕文明;农业现代化;农业系统进化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5-0003-09

##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of Ethical Capac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REN Ji-zhou<sup>1</sup> FANG Xi-liang<sup>2</sup> LIN Hui-long<sup>3</sup>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rassland Agro-Ecosystem, School of Pastoral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s:** Ethical capacity means the systematic inclusion of various social components by social ethics, in order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Society has made systematic evolution in systems coupling, so to release production potential and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Systems coupling always goes side by side with systems conflict. The former is positive to social progress for its release of production potential, while the latter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system progress. In the dual structure of the urban-rural of China's agricultural society, the great deal of most social benefits generated by positive effects of systems coupling have been taken by socially dominated urban areas, which became the main beneficia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negative

**【收稿日期】**2017-09-01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中国草业发展战略研究”,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生态文明战略视域中的‘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16XZX013)

**【作者简介】**任继周(1924—),男,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草原学、草原调查与规划、草原生态化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等方面研究,近年来尤其致力于农业系统发展史和农业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方锡良(1977—),男,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以及农业伦理学相关研究;林慧龙(1965—),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草业系统分析、草业经济与政策以及农业伦理学等方面的相关研究。

effects caused by systems conflict fall entirely on the weak rural side, which benefit less or even nothing from social development and become a less beneficial party or a victim.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thereby appear opposite each other with conflicting interests. In the past, the less attention paid to vulnerable groups has hindered social development, or resulted in social turmoil. The culture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of the imperial period barely maintained the fragile stability of the ethical capacity. However, in current post-industrialization era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capacity cannot bear the contradictions caused by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diversification and coexist of multiple systems coupling and systems conflict. Chinese farmers have suffered from unfair treatment since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which triggering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so hindering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globalization spreading, social progress is unstoppable and the same is true with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ccordingly, a corresponding ethical capacity is bound to be expanded and a new agricultural ethics is about to take its shape.

**Key words:** Ethical capacity; systems coupling; systems conflict; farming civil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grisystems evolution

## 一、伦理学容量的涵义

伦理学容量(Ethical capacity)意指社会伦理观对各类社会组分的系统性包容能力。它体现社会伦理观对社会诸系统的理解、协调能力和弹性机制。

伦理学容量的大小与社会的多维结构有关。社会由它所包含的诸“系统(systems)”构成,例如农业系统、工业系统、商业系统、教育系统、卫生系统、金融系统、信息系统、宗教系统等等。不同的系统为各自的“界面(interface)”所包围,越出系统的界面,系统内部的相关运行规律即归于无效。社会所包含的系统越多,社会的多维结构越复杂,不同系统和族群之间的思维方式和伦理规范彼此融通越广泛深入,其伦理学容量也越大。生活于这个社会的人的视野也较为开阔,能够容纳更多异于自我的事物或现象。

我们所常说的“少见多怪”,就是从反面说明系统的容量特征。清末民初时期一位缠脚的大家闺秀,看见青年女子的“大脚片子”,就很难接受,投以嘲笑的目光。农业社会的人走进工业社会,就会发现许多诸如此类的“怪事”,难以理解,甚至加以抵制。当工业化时代的人走进信息时代,也会感到处处新奇。不同种族的人也多因不相理解而互相敌视。为一个行业所定格的人,譬如商业系统的商人与科技系统的科学家相处,有时难以找到共同语言。为一个时代所定格的人,进入另一时代困难就更大。这是因为一个行业、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思维方式、伦理规范所体现的伦理学容量。定位于特定社会的人对于另类时代或另类社会现象,常因了解不足而产生抗拒情绪。例如我们常见的国家与宗教战争、民族纷争、意识形态斗争等,就源于此类互不适应而互相敌视的状态。其实质就是想保卫自己系统的界面,或以自己系统的界面来覆盖其他系统,实现系统入侵或系统吞并。

农业社会所包含系统的复杂性与工商业社会相比,要简单得多,与后工业化的信息时代相比,差距更大。我们回顾清末洋务运动暴露的许多笑柄,就不难理解当我们从农业社会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时候,而我们的伦理学容量还处于“农耕文明”阶段,尽管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曾立下不朽的功勋,但到今天某些人还以此自满、自豪,是多么不合时宜。依据历史发展的时代需求,转变我国农业伦理观,拓展社会伦理学容量已刻不容缓。

我们用社会伦理学容量的视角来考察历史,会有新的理解;同样我们用它来审视我们当前的工作,也会发现不少盲点亟待纠正。

## 二、社会的进化与社会伦理学容量的扩增

人类从大自然的渔猎社会走来,逐步随着社会分工而产生了聚落,进而过渡为城堡,又逐步发展为城市。由城市分工而产生复杂的界面矩阵系统,进而产生界面矩阵群。界面矩阵群的巨量界面必然发生巨量的系统耦合与系统相悖,从而发生了巨量的社会伦理学问题。

人类原始社会结构简单而扁平,就是族群和他们的领袖简单组分。游牧社会因为迁徙频繁,不需定居的城邑。只是受了农耕社会的影响,或借鉴了某些农耕社会的管理技术,引入了小规模冶炼锻造工艺,以制造生活用具,特别是战争所需要的武器,如锻造战刀,从而产生族群聚落。这时的社会伦理系统只有个人与个人、族群与头人、族群与生存地境之间的伦理关联。他们约定成俗,不需要契约性的或法律的约束。如在青海、甘肃和内蒙牧区至今仍遵循着放牧管理的“乡规民约”。他们的生存单位为“放牧系统单元”,即人居一草地一畜群的生存地境。这个放牧系统单元的概念至关重要,影响深远,西欧的现代农业系统即源于此,直到现代化的今天仍然不失其重要性。我们将“放牧系统单元”称之为人类文明的最初基因也许并不过分。当时发生的族群之间的纷争,无非就是满足放牧系统单元的竞争。游牧民族在广袤草原上游弋不定,衍生了以勇于冒险和掠夺为荣、维护族群生存发展的草原畜牧业伦理观。今天看来,这也许是最接近于海洋文明的陆地文明伦理观,内涵宝贵的伦理学基因。

随着游牧社会的发展,从放牧系统单元的草地中,分出部分土地用为农田,随之有了农耕系统的定居聚落。由此逐步发展为城堡及其所衍化的城市。有了城市,社会生态统内部分工趋于细化。所谓分工细化,就是农业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各自依据自己的界面,通过序参量<sup>①</sup>,与其它生态系统发生系统耦合,导致系统进化。系统进化中构建新的界面系统,随着系统耦合的层次不断增多,相应产生了界面矩阵。农业系统要处理如此复杂的界面关系,伦理学容量与之俱增。

在生活节奏缓慢的传统农业社会,其伦理学容量的扩大,从物理学层面的物质容量发展到精神层面的伦理学容量,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且举一个山西的农耕系统与内蒙古的草原畜牧系统的系统耦合例子。我们都知道,晋商曾经富可敌国,他们的票号在清末民初曾遍布全国。但考察他们第一桶金的获得,不是“走西口”,就是“下关东”,几乎无一例外。这两个走向都可与草原畜牧系统实现系统耦合从而获取效益。从战国时期的晋国<sup>②</sup>开始,内地农耕民族与边境草原游牧民族在接壤部自发地发生系统耦合,此后经过数千年的历史融合而结出了晋商这个硕果。同样,内蒙古草原畜牧系统,汲取了农耕文明的有益部分,取得了相应的发展。他们从农耕系统获取有益物资,生活变得相对富裕的同时,也使蒙族文化达到新高度。至今内蒙古甚至连语言也说的是山西方言。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内蒙古现代大型产业的勃兴,如以伊利、蒙牛为代表的牛奶业、以鄂尔多斯为代表的绒毛业和以蒙草、草都集团为代表的草业等都可跻身世界大型企业行列。追索其文化源头,无不与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两者的融合,扩大伦理学系统容量相关。这种融合应归功于农耕系统与草原畜牧业系统两者实现系统耦合和系统进化,底成于社会伦理学容量较大的、新的农牧业社会系统。与此同时衍生了农牧社会文化。这个农牧业社会文化,是在得到序参量的护持,保持其本底系统不受损害,并有一定发展的前提下诞生的新系统,其社会伦理学容量大增,从而爆发了新的能量,达到新高度,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GDP处于全国第六位的内蒙古。

① 作者按:序参量不是某种具体物质,而是可发生系统耦合的不同生态系统所具有的“公质”,约当数学中的公约数。在农业系统中的系统耦合所采取序参量多为能(energy)或能的异化物,如某些农产品采取以货易货方式而形成的茶马市场,或更进一步异化为货币。

② 战国时期农耕系统的晋国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匈奴接壤。

不妨再举一个反面的例子。那就是春秋时期的秦国。秦穆公在位时期(公元前 659 年~前 621 年)西向草原游牧系统大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sup>①</sup>,改封地为县治。秦在与西戎的长期斗争与融合中,不仅增强了国力,还吸纳了草原游牧文化,从西部给逐渐衰落的周朝“礼乐”伦理大厦送来新风。这发生在商鞅变法(公元前 356 年)以前 303 年,远早于晋国与北邻的草原游牧系统的融合,从而产生了有别于内地文化的“虎狼之秦”新文化雏形。可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仅未能继续良性发展,扩大社会伦理学容量,至秦始皇时期反而“以吏为师”,“焚书坑儒”<sup>②</sup>,建立了皇权政治,一扫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宽容气象,社会伦理学容量被急剧压缩,秦始皇在短短 15 年内就断送了秦国 600 年的基业。

秦的灭亡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扇窗口实际上半开半闭,即所谓“内法外儒”,直到汉武帝,其法家本质凸显,诚如司马光所说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sup>③</sup>这一传统伴随城乡二元结构和农耕文明,代代相传,历时两千多年,直到近代绵延不绝。文革期间,一度聚焦“评法批儒”,实为力挺法家的权术诡道,坚持农耕文明和它所支撑的理论系统。这反射了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耕战思想的历史烙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之难以消除,农民的国民权利之迟迟未能落实,应与此不无关联。

### 三、伦理学容量与农业结构改革

前面我们说到晋人的农耕系统与蒙人的草原畜牧系统之间的融合收获硕果。尽管从清末起,晋商就受到外国工商金融业入侵和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混战的干扰,但在不绝如缕的序参量的护持下,穿越历史重重磨难,与草原地区的融合从未中断。但是 20 世纪 50~80 年代的极左思潮高涨,“割资本主义尾巴”,断绝商贸活动,给序参量以致命打击。当时在内蒙古草原牧区提出“农业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sup>④</sup>,强制在草原上大举“开荒”种地,把优质草地开辟为粮田,农耕系统向草原畜牧系统大举扩张,破坏草原达 1.5 亿亩,使草原畜牧系统遭受空前破坏。

与此同时,在农耕地区施行严格的户籍制,限制农民“外流”,将农村人口牢固于当地农业集体之中,不论土地资源是否适当,一律实施“以粮为纲”的政策,强求粮食自给。排斥养殖业与其它产业,断绝与外地资源的流通,土地资源被严重耗竭。晋商的务商传统也被彻底断绝。好在农牧系统衍发的农牧业文化在民间一缕尚存,只要时机恰当就会伺机重生。因此在全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看到今天内蒙古草牧业的振兴。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伦理学容量受到农耕文明的入侵,不少地方将农耕地系统的土改政策强行推广到草原牧区。将“放牧系统单元”的生存地境完整性置于不顾,推行草原承包到户,把草地按人头分割(图 1),各户普设围栏,施行定居定牧,草地资源被碎片化。原来设想围封保护草原,给家畜少量补充舍饲。但因缺少“放牧系统单元”的支撑,牧场不足,补饲逐步增加到几个月,甚至半年,或大半年。牧民不但为补饲承受了难以负担的劳动量,而且买草补饲费用几乎倾其所有,甚至有些牧民债台高筑。而舍饲家畜营养不良,患偏食症,互相啃毛(图 2-4)。这种无视界面区别,抛弃序参量的制约,以农耕系统覆盖草原畜牧系统的不当措施,导致草地资源和牧民生计陷于困境。

① 司马迁:《史记》卷 5《秦本纪第五》,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94 页。

② 参见任继周、齐文涛、胥刚:《中华农耕文明伦理观的历史足迹及城乡二元结构伦理溯源》,《中国农史》2013 年第 6 期及 2014 年第 1 期。

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2《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中华书局,1956 年,第 747 页。

④ 凤 荣:《大庆市土地沙化现状及治理对策》,《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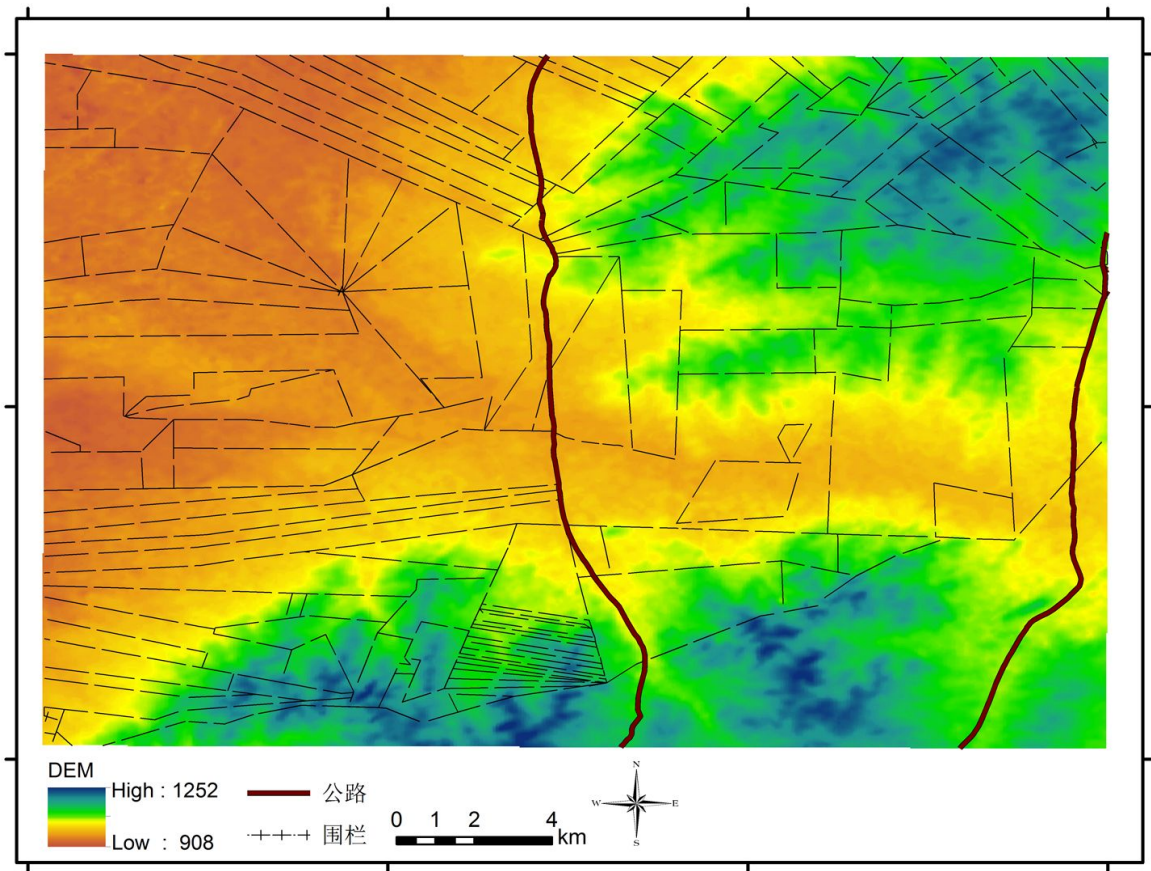


图 1 内蒙古某巴嘎草地按户分割围栏示意图

该地区总面积约为 63 万亩,被围栏分割为 128 块,最大地块面积约为 3.38 万亩,最小地块面积约为 300 亩(林慧龙制图)。



图 2 因营养不良引发偏食症的舍饲绵羊已将羊毛啃光<sup>①</sup>



图 3 牧民给羊穿上布衣,防止互啃羊毛<sup>②</sup>

① 图 2 引自 <http://www.xici.net/d33386148.htm>

② 图 3 引自 <http://www.xici.net/d33386148.htm>



图4 内蒙古某巴嘎牧户舍饲绵羊因营养不良患偏食症,互啃羊毛  
左图为一只羊正在啃另一只羊的毛,右图为防止互相啃毛给羊戴了口罩(韩念勇供稿)

上述事例暴露了农耕文明衍生的农业伦理学容量过分狭小,一旦不适当地扩大到草原畜牧系统,造成怎样的不良后果。

#### 四、伦理学容量的扩大倒逼中国农业改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框架下,经历了两次全国规模的农业结构大改革。一次是1949年到20世纪末,从小农经济改为计划经济的大农业系统,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大饥荒,大家记忆犹新,无需赘言。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为了追求粮食高产,大水、大肥、大农药,高投入的结果,引发水土污染,食物污染,不但产品成本高于进口产品到岸价,还严重浪费了水土资源,危及食物及生态安全。

原来支撑棉花、粮食生产的杠杆先后夭折,油料作物处于寻寻觅觅的艰苦处境。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在大国崛起的一片大好形势下,却发生了全国为之忧虑的“三农问题”。形势倒逼我们不得不考虑以调结构、去库存、去杠杆、供给侧改革为主要内容的重大改革措施。实际上第三次农业结构改革已经拉开序幕。

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伦理学容量太小,既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又没有对弱势群体予以适当伦理关怀。

随着人类社会的生态系统增多,例如草原系统、农耕系统、森林系统、水面系统(如东南沿海的蚕民,以舟楫水产为生)、商贸系统、海洋系统等等,甚至扩大到后工业革命时代的信息系统等,形成界面复杂的矩阵群界面巨系统,各个界面之间无不发生伦理学关联,社会的伦理学容量处于无限量扩大之中。

社会系统由扁平发展至厚实高大,进而无限量扩充,成为无所不在的恢恢巨网,笼罩大千世界。巨网的节点就是城市。其动力源于诸多产业系统,以城市为节点不停地发生系统耦合与系统相悖,在两者的争论中遵循中度原则,不断扩大伦理学容量,于是社会不断前进,文化也不断蜕变更新。

历史在永不停步的前进之中,系统耦合与系统相悖不断发生。前者使一部分社会成员受益,推动社会发展。后者则使社会另一部分成员成为非受益者或受害者。两者之间的争斗成为社会永恒的话题。伦理学的任务就是如何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取得社会伦理学容量的扩大。

农业生态系统总是倾向于获取最大的系统耦合效益,保持系统的生存和发展活力。但是伦理学

的中度原则<sup>①</sup>告诫我们,永远不要忽略系统相悖的负能量。聆听系统相悖非受益方甚至受害方的呼声至关重要,这是弱势群体的求生信号。世界的乱源,古今中外,莫不与系统相悖的处理不当有关。因此我们不应该把系统相悖全然视为与系统进化无关的负值。只有负值得以消减,正值才能稳增。农业伦理学所承担的重大任务就是扩大其系统伦理学容量,对系统相悖的弱势一方予以较多的关注、理解,保护他们的合理权益,建构保障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sup>②</sup>。

社会稳定基于社会容量能包容的诸多相关系统,使参与系统耦合的各方都可获取适当的利益,即所谓共赢,同时相关各方承担适当的奉献。所谓奉献,其实质就是自愿接受可以承受的系统相悖带来的负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享受生态贡献的同时,要提倡生态保护;我们在与友邻交易时,要提倡适当让利;在武力对抗时要提倡“上兵伐谋”<sup>③</sup>,不杀俘虏;在收获农产品时,种植业要保护地力,林业要砍伐适度;畜牧业要留有“临界贮草量”<sup>④</sup>和保留种畜。概括言之,不要“竭泽而渔”,以利保持生态健康,力求系统相悖所含负能量处于社会伦理学容量以内。

在这个容量以内系统耦合的正能量保持大于系统相悖的负能量。社会增益多于社会耗损,合作多于对抗。从而使社会系统的凝聚力超过分散力。正如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sup>⑤</sup>这将是我们希望建立的世界利益共同体的康庄大道。否则,如超过这个容量,一旦对抗和斗争占据社会主流,社会系统将逐步失序而趋向崩溃。

我国农业在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巨生态系统中,处于众多层次的界面矩阵之中。先是中国农业进入WTO所经历的震荡,接着将迎来建设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其复杂的界面矩阵所引发的系统耦合无限量发生,而系统相悖也相应的无限量发生。面对这一系列复杂问题,其关键在于如何迎接人类从未遇到过的巨大农业伦理学容量这一新命题。

中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城镇系统与乡村系统发生的系统耦合,维系了社会系统的生存,而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创建了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但在这一系统耦合过程中,系统相悖带来的重负总是压向农村一侧,为此做出牺牲最多的是因系统相悖而受益较少甚至权益受损的农村和农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城乡系统耦合既使社会收益的正值和社会受害的负值并存,其结果还是换来了社会的发展,即中华的农耕文明的光大。这一伦理学悖论,在当时社会表达为利大于弊,处于社会伦理学容量以内。

① 中度原则,是从系统论角度和农业伦理学角度对传统“中道原则”的传承与发展。传统中道原则如“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强调认识事物、分析问题时,充分把握事物的正面与负面、过度与不及等两端,相互叩问,换位思考,调节各系统之间的利益,达致必要的动态平衡。“中”就是必要的“度”和“节”,“执两用中”其实就是在“过与不及”之间保持弹性调剂,从而“中道而行”,与时俱进,既合乎大义(经),又能变易日新(权),是为“君子而时中”。约而言之,执两用中、中道而行;因势时中,经权相应;日新又新,社会中正,以底于社会伦理学容量之扩大。

② 对系统耦合过程中非受益方、弱势一方的关注,可借鉴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罗尔斯“正义论”的两大原则:(1)第一原则是平等自由原则,它强调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普遍而广泛的自由权利;(2)第二原则涉及到不平等安排的合理机制,它同时包括差别原则和机会均等原则。它强调不平等的社会或经济安排,应符合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的最大利益,同时机会应向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均等开放。《正义论》中的“差别原则”,有助于我们多关注和思考系统相悖的弱势一方的权益保障。

③ 《孙子兵法·谋攻篇》:“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参见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年,第43-45页。

④ 任继周:《草原资源的草业评价指标体系刍议》,载农牧渔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编:《中国畜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242-262页。

⑤ 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10页。



但当社会进入后工业化以后,系统相悖受益较少的农村和农民,其所遭受的压力没有及时得到关注和解决,其所承受的压力超越了社会伦理学容量,城乡二元结构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例如农村户口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同样的医疗、教育、交通、文化以及一系列的公共福利。农民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 1/3 或更少一些。起于西周时代的农业劳动者所处的奴隶地位沿袭数千年而流毒未绝。尽管新中国建立以来,政府从未停止过多种支农政策,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破除,一个时期反而有所强化。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使上亿进城务工农民失去完整的家庭结构,几十年来,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一代又一代,累计当以亿计,得不到父母抚爱和社会关怀,这无疑将为社会发展留下隐患<sup>①</sup>。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虽然对“城乡二元结构”弊端有所反思,但农村贫困沉痾已久,非短期可以逆转,严重阻滞了社会进步。这一非正义的社会现象,已经越过社会伦理学容量阈限,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阻力。

这里为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巧妙地利用中国传统“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巨大反差,反其道而用之,动员农村和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政权,应该对“城乡二元结构”有所反思而加以削弱。但遗憾的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一度有所强化,直到本世纪初 2002 年的中共十六大,才明确城市反哺农村,又过了十年,2012 年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消灭城乡差别的明确目标并采取有效措施,距新中国建国已经过了近 70 年了。城乡二元结构之泯灭如此艰难,其中有多种原因,但最主要问题在于对城市的社会生态学意义认识不足,甚至抱有偏见。

建国初期,政府虽然利用了城市作为国家政权的中心,但对城市在社会系统中的伦理学意义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城市是罪恶的渊薮,即通常所说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染缸”。于是一度将公职人员统统派到乡村去进行思想改造,即风行一时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甚至发生这样的悖论,作为工农联盟的领导阶级的工人也要离开城市,到乡下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1968 年《甘肃日报》刊出的一篇报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图 5),经《人民日报》转载并发表评论给以支持,一时间造成全国性离城下乡潮。追溯其思想根源,应含有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固农耕之本,抑工商



图 5 1968 年流行全国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宣传画<sup>②</sup>

① 仅从伦理亲情和性格养成角度来看,就已经留有诸多隐患。伦理亲情上的结构性缺失,对于广大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性格养成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又会被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而进一步强化为某种内在的社会不公感,随着代际传递,伦理亲情的缺失、性格的孤僻偏激加之社会不公感三者叠加,甚至于转化为某种社会怨恨,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② 参考吴剑锋的博客,引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29bcef0100dc60.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29bcef0100dc60.html)



之末的思想烙印<sup>②</sup>。这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至于城市是当今社会系统各类产业及思想系统的界面汇集的中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念更是无从谈起。处理国家诸多社会系统相悖问题，扩大社会伦理学容量，只有界面汇集的城市才能提供适当环境。

上述事例显然看出传统农耕文明的伦理学容量过分狭小，不适当地扩大到草原畜牧系统，发生怎样的不良后果。

## 五、我国伦理学容量扩增，新的农业伦理学曙光在望

伦理学容量的问题，过去较少为伦理学工作者关注。但它对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对一个时代的农业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

目前我们面临社会伦理学容量扩大的良好机遇，即历史上长期使社会对立的城乡二元结构，自十八大以来已经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农村户籍壁垒的逐渐消除和城市房产购租同权的决定，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起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进城务工的农民与城市居民将比肩而立，具有完全的国民身份，是我国历史性大跃进。

恰在此时，我们看到陈剑平等 24 位工程院院士提出“关于推进现代农业综合体建设与示范的建议”。这个建议提出“打造科学安全的生产管理、扁平高效的生产流通、全程追溯的监测检测三大体系。实现‘市民餐桌安全、农民创富增收、农业转型升级、美丽乡村与生态安全’四者共赢”。这三大体系，四个共赢，涉及生产、加工、流通、管理、检验、监测各个系统和与之相关的多个界面，几乎囊括了绝大部分社会系统，扩大了社会伦理学容量的必要素材。这必将引发一系列系统进化和众多界面结构的重建，它所建设的不仅仅是现代化农业，还将对我们古老的“农耕文明”的伦理学容量带来飞跃式扩容，一个全新的有别于传统“农耕文明”的“中华文明”和它所包含的新型农业伦理学已经曙光在望。

## [参 考 文 献]

- [1] 司马迁. 史记(第一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 司马光. 资治通鉴(第二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3] 凤 荣. 大庆市土地沙化现状及治理对策[J].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 2006, (4).
- [4] 任继周. 草原资源的草业评价指标体系刍议[A]. 农牧渔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中国畜牧业发展战略研究[C].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8.
- [5] 章锡琛, 点校. 张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6] David P. Levine. The Capacity for Ethical Conduct[M]. Routledge, 2012.

②《管子·治国》篇：“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参见黎翔凤撰：《管子校注（中）》，中华书局，2004 年，第 924 页。